

吉爾吉特寫本 (Gilgit Manuscripts) 簡介

蔡耀明 (20200922)

1. 序言簡介

原本在喀什米爾 (Kashmir) 地區，如今歸屬巴基斯坦 (Pakistan) 的吉爾吉特 (Gilgit)，在 1930 年代出土的梵文佛典寫本及相關文物，是當代佛教研究界的一大盛事，並且提供佛教研究豐富且寶貴的材料。若能予以認識且運用，將能延伸佛教研究在材料運用上的格局，進而有助拓展佛教研究的視野。

2. 考古發現與後續保存

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的發現，首先由斯坦因 (Sir Aurel Stein) 在 1931 年公諸於世。之後，不少出土的葉片卻已毀壞，或轉了好幾手而不知所終。至於已知去向的部分，則四散在很多地方，其中包括新德里、Ujjain, Poona, 孟買、巴基斯坦、尼泊爾、倫敦。

在喀什米爾，針對 1931 年出土的大批寫本加以校讀的任務，由 Nalinaksha Dutt 從 1939-59 年，以《吉爾吉特寫本》(*Gilgit Manuscripts*) 為書名，總共出版了四大冊，分成九部分亦即九本。在 1947-48 年間，由於喀什米爾受到內亂和外犯雙重的侵襲，收藏在 Srinagar 的 1931 年出土的寫本，即基於安全的考量，被搬到新德里的印度國家檔案處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New Delhi)，以迄於今。新德里所接收的寫本，則由 Raghu Vira 和 Lokesh Chandra 從 1960-74 年，以《吉爾吉特佛教寫本》(*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為書名出版照相複製本，列在新德里「印度文化國際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百藏系列」(*Śata-Pitaka Series*) 的第十大冊，而這一大冊總共就有十本之多。

3. 主要內容

詳細的介紹與討論，可參閱：蔡耀明，〈吉爾吉特 (Gilgit) 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第 13 期 (2000 年 6 月)，頁 1-128。

吉爾吉特佛典寫本最常用的字體，學者給的命名不一，包括「Gilgit/Bamiyan 書法麗飾字體」(*Gilgit/Bamiyan calligraphic ornate script*)、「Śāradā 原型」(*Protośāradā*) 字體、「直立笈多」(*Upright Gupta*) 字體。經由字體的譜系來推斷，寫本完成的年代約略在公元第五世紀末到第七世紀之間。

吉爾吉特佛典的抄寫，極可能歷經好幾百年的時光，並且實際用在佛教的日常運作。整體來看，吉爾吉特以經教為骨幹，至於阿毗達磨論書、大乘論書、部派屬性、以及車乘對立，幾乎都不怎麼顯著或甚至不露痕跡。

《僧伽吒經》、《三摩地王經》、《般若經》、《妙法蓮花經》、《藥師經》、和《妙譬喻／妙功業》(*Avadāna*) 等經典在吉爾吉特的出土，大致可以當做吉爾吉特和中亞地區乃至漢地在佛典流傳上的一些共通的愛好所在。至於其中有若干經典在吉爾吉特都還留存好幾個傳本，尤其是《僧伽託經》和《藥師經》，雖然並非僅出現於吉爾吉特，但至少可以看成相當引人注目的特色，說明這些經典曾在吉爾吉特受到特別程度的重視。

吉爾吉特的佛典所包含的部類頗為廣泛。對於一些流通較廣的佛典，吉爾吉特和中亞地區乃至漢地都相當一致給予重視。儘管如此，在探討佛典流傳史上另有一些同樣受到注目的現存的梵文本或漢譯本，其相當的傳本卻在吉爾吉特的佛典清單中意外缺席。例如，《法句經／優陀那品》(*Dharma-pada/ Udāna-varga*)、《金光明最勝王經》(*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a*)、《大乘涅槃經》、以及有關阿彌陀佛(*Amitābha/ Amitāyus*) 的經典，都有若干個中亞傳本及漢譯本，但是並未見到吉爾吉特的傳本。再者，吉爾吉特有《二萬五千頌的般若波羅蜜多經》、《一萬八千頌的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但是看不到在其它地區流通頗廣的《八千頌的般若波羅蜜多經》，而《八千頌的般若波羅蜜多經》早在公元 179 年就由支婁迦讖(*Lokakṣema*) 譯成《道行般若經》(T. 224)。

4. 影響

古印度的第一手史料只有極其少數能夠留傳到今天，而吉爾吉特出土的文物，很自然成為歷史研究上極其珍貴的材料，使佛教研究的材料得以大大拓展而益形豐富。

然而，吉爾吉特佛典寫本初步只表現成一大堆素材，接著還是要看吾人如何施加處理以轉變成學術上可用的材料，如何關聯到現有的其它材料，如何整合到佛教研究進一層的探討路徑，以及如何開闊到能夠讓鄰近學科方便運用。這些處理上的轉折步驟，在在需要專門且紮實的學術訓練的底子加上相當開闊的格局，也在在可以對研究者的學術投入、學術能力、與學術眼光，構成不等程度的挑戰與衝擊。

整個來說，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以經典和律典為主幹，而密乘典籍的比例亦相當可觀，至於論書則寥寥無幾，除了留存下來的 19 張頁片的《阿毗達磨法蘊足論》以及 6 張頁片的《施設足論·世間施設》之外，幾乎看不到任何中觀學派或瑜伽行學派的論書。如果從吉爾吉特所在的喀什米爾地區來衡量，像這樣的情形，可以說和一般佛教史學者原先可能的預期有極大的差距，因為喀什米爾習慣被認為乃佛教史上製造與流通部派論書的重鎮。既然留存的部派論書在數目上如此微不足道，若要勉強把吉爾吉特佛典寫本所承載的佛教部派化，也就是貼上部派歸屬的固定標籤，在證據上無論如何是難以站得住腳的。

吉爾吉特佛典寫本，不見證有所謂「部派佛教時代」的存在，也不支持所謂「大乘論書時代」的說法。這帶給吾人的啟示是，一些論師撰寫論著或註疏是一回事，各地的佛教界是不是廣泛接納這些論師之作而成為論書盛行的「時代」則是很不相同的另一回事。

此外，《藥師經》曾被一些較早期的日本學者當成一部疑偽經在看待。但是，後來發現吉爾吉特至少有三個不同傳本的《藥師經》，由此才意識到不可能出之於漢地所偽造。像《藥師經》的例子，就足以讓吾人警覺，以前的一些學者以欠缺梵文本為理由，再根據歷代的漢文經錄去論斷一些佛典是否疑偽，實在並不是很可取的辦法，而有深加檢討的必要。